本书是作为教材而撰写的，作者是美国学者里昂·P.巴拉达特。本书中文版译自英文第10版，原书最新为第11版，作者已于前些年去世，如无修订者，则应无更新的版本。

相较于Andrew Heywood的*Politics*，本书在“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下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讨论，作者对工业革命以来所涌现的所有意识形态（至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那些）进行了介绍。但本书在观点上的局限性亦较为显著。一是作者采用的仍是一维的政治光谱分析，在今天看来已经显得很不够用。二是作者对意识形态及其起源的回顾有流于表面之嫌（即本书导读者刘苏里所说的本书的“要害”第一章），如，“意识形态”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吗？那么为何还会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自己的“唯物主义”特性？且“意识”与“唯心主义”极为紧密联系也无法得到解释。三，则是本书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有过于机械化、静止化的倾向。不过，本书的定位并不是对意识形态及其起源做一学术性的、开创性的、深入的讨论，而是在于向读者（尤其是对“意识形态”一知半解，乃至一无所知的读者）介绍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及其谱系脉络。就此来说，本书还算做得相当不错。

鉴于笔者对政治学并非没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在，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有所了解，但仍有新的，笔者以前未完全掌握的部分在，不过稍显零碎。作者从三点上区分了哲学与意识形态，哲学的深奥性；哲学可为单一个体信服而不要求一定是某个群体的准则；哲学倾向于引发自省而不是跟随。

保守主义者，相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对人性往往持有更消极的态度，不信任人类的理性，因而更主张对社会的个体进行威权的控制。当两个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如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同时支持一项政策（如反对堕胎）时，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人们所预期的结果。反堕胎自然是自由主义者的通常立场，但保守主义者也可能希望借此以减少福利支出而赞同反堕胎政策。

作者提出的一个“普遍法则”，即政治光谱上偏左倾的人倾向于强调人权，偏右侧的人倾向于强调财产权。但实际上，共产党两者都想否定，但又往往被划分为极左的意识形态之一。这一理论上的缺陷再好不过的反映了一维政治光谱的局限性，共产党将会以极其古怪的方式在一维政治光谱上占据其位置。但作者对于政治光谱的一些见解还是有启发之处，如人们所持有的人性观往往影响了其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如偏向“人性本恶”者可能会在政治光谱的右边。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下，即使是同一个人，其思想完全没有变化，但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作者将“最古老的意识形态”这一地位赋予了民族主义，笔者认为至少就目前的证据来说，是恰当的，而不是如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只是现代的造物。不过说起来，其实本书中所提到的那些意识形态，最基础的“原型”大多在“轴心时代”以后不久都已经存在，只是没有今日那般复杂、精细。作者将民族主义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联系在了一起，指出人民与国家之间这种密切的交互关系，正是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我们也看到，在那些几乎不具备“社会契约精神”的国家中，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对民族主义的煽动，而强化自己的权力。社会契约可能会在特定情况下加强民族主义（如国家遭遇入侵时，为了维护自己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比之于享有低权利国民更可能爆发民族主义热情），但两者不总是正相关的。

自然法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普遍信念（如洛克），但当代自由主义者并不倾向于认同自然法的理念，而是在边沁的修正下，偏向于主张实证法。这里不仅是哲学与政治思想的交叉，也是法学与政治思想的交互，只不过似乎不见“历史法学”的理论有什么作用，笔者猜想应当与保守主义的观点密切相关。虽然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格林通过鼓励人们利用政府机构来保护自己免受有权势者的经济力压迫而发展了福利国家概念的早期依据，但近代欧洲早期较为完善的福利政策却是由向来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的俾斯麦所推动的，看来确实并非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罗马。

作者指出共和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的相应性，一个政府愈是偏向共和体制，则越不民主（此处的“共和”主要指的是间接的民主体制）。但我们却不能说“民主”与“共和”是矛盾的，只不过在特定的意义上两者不可能同时达到最大值。

“虚无主义者”近来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哲学上的观点。不过在本书中，“虚无主义者”最初源自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被认为是一群最感失望的激进分子，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一种，相信推翻政府是必要的。这一特征显然与今日大多数语境下“虚无主义者”消极、看空一切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与古希腊“犬儒主义”意义变化相似的跳转。这倒又是一个例证，说明政治光谱的两头极端处，有时不仅不是最遥远的两端，甚至可能是相通的。

“全球大多数人都把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先发制人的征服和占领， 也看做国家恐怖主义。”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但如果放在比较的视野下，似乎没有几场战争不可被归类为“国家恐怖主义”的。

最近的时代，似乎愈发不再是曾经的“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时代，许多当下时兴的意识形态，如女权主义与环境保护主义，往往与政府政治制度的光系远没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来得紧密。这在一个侧面证明，今日已不是剧烈变革的时代。意识形态的“鼓动性”在许多领域都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然也会退出这些地方。